

“全球化”问题的思考是一种关系式的认知方式

宋伟杰

如是一幅图景，在近期的理论视野以及大众传媒的形象构造中都并不陌生：一个暂时被悬置了种族—民族—国家身分（但往往是第一世界）的主体，乘着波音 747 的飞机跨国旅行，享受着中国风味的美妙食品，观赏过日本的建筑与茶道，身著巴黎的时髦服装，足蹬 Nike 牌旅游鞋，乘坐着德国制造的汽车，间或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领受原始的风光和酣畅淋漓的日光浴，以八十年代的命名方式，这姑且可以被视为后现代时期的一种症候，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早在他那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Capitalism）的文章中，就已谈及这一状况；^①而在九十年代的今天，也许我们会更换一个名称，用来指涉这种情境，这就是愈演愈烈的“全球化”。

命名方式的转换，并非理论研究者作为学院之内“游戏的人”，所玩弄的复杂繁琐的语言游戏，而是对时代状况更富洞察的关注与思考。对此转换，已有不少学者在论述“全球化”演变过程的专著中，详细阐发。聊举一例，罗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的“关键概念”（Key Ideas）丛书，就有一本名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理论作品，其作者沃特斯（Malcolm Waters）指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八十年代的关键概念，那么，九十年代日益明显的关键词则是“全球化”^②。命名方式的变化，正是对既往思路的反省与矫正，也是理论家与“生活世界”之关系的进一步定位，而理论本身的活跃与用途便正在于此。阿皮亚曾经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后现代’的‘后’是否便是‘后殖民’的‘后’”^③。这种提问方式，便是放弃简单化、规约化的思考，更为复杂地理解社会文化思潮之演变的不懈努力。然而，“全球化”出现于何时？何为“全球化”？

沃特斯翻查《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89）

发现，早在四百年前，即已出现“global”一词，但“globalization”，“globalize”，“globalizing”等用法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使用。1961年“韦伯斯特”大词典首次为“globalism”（全球主义）与“globalization”（全球化）提供定义，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该词才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性。“全球化”一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中，1987年尚一个条目也难以找到，到1994年也还只有34个条目^④。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这一名词自八十年代中期以降歧义纷呈的使用乃至滥用，使得爬梳这一关键术语在世界各地纷繁复杂的当代生活中具体清晰的发展脉络，显得困难重重^⑤。沃特斯综合种种学说，指出对该词词源的大致追溯，可以发现“全球化”现象呈现三种可能的历史走向：一，“全球化”可能早已开始，它与（启蒙的）历史同步，只是在八十年代以后才陡然间明显起来；二，“全球化”的出现比第一种可能要晚，是与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而来，也是在近期浮出历史地表的；三，“全球化”乃一种新现象，是在后工业化、后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的解体与冲突当中应运而生的。^⑥

“全球化”的源起姑且存而不论，对“全球化”的界定也并未在学界达成共识。罗伯森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也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强化。”^⑦阿那森（J. Arnason）则提醒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全球化”绝非“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同义词，尽管部分同质化的过程在所难免。^⑧沃特斯视“全球化”为一个核心概念，“藉之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禧年的转变。”^⑨费泽斯通（M. Featherstone）则关注“全球文化”或者“文化的全球化”。他用相对宽泛的文化定义以及对进程的关注，指出文化的整合与文化的裂解不仅仅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层面，而且会超越国家—社会的单位，在跨国族或者跨社会的层面运作。^⑩德里克（Arif Dirlik）借助弗罗贝尔等人描述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用他所喜爱的“全球资本主义”，来描述生产的跨国化，生产过程的全球化。^⑪阿帕杜莱则极富洞识地指出，当今世界所卷入的互动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而

“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紧张关系”^⑫。我们无法一一列出“全球化”理论的诸多分支。从古典社会学时期的雏形表述,到近期“全球化”理论的迅猛发展,这一问题是与圣西蒙,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帕森斯(T. Parsons),麦克鲁汉(M. McLuhan),沃伦斯坦(I. Wallerstein),罗伯森(R. Robertson),吉登斯(A. Giddens),哈维(D. Harvey),贝克(U. Beck),拉什(S. Lash)和乌瑞(J. Urry)等人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按照沃特斯言简意赅的分类,全球化在社会生活的三个领域得以呈现。其一是经济领域,进行的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其二是政治领域,涉及权力的集中和运动,权威的构造与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及对人口和地区的控制。其三为文化领域,关系到意义,信仰,嗜好,趣味,价值观等象征符号的生产,交换和表达。韦伯和贝尔视之为三个独立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则以为经济是政治与文化的构成成分;按照帕森斯的观点,文化则决定着经济和政治。^⑬随着“全球化”问题的日趋复杂,三个领域之间交错与“重叠”的模式,取代了以—种领域为基本领域的理论思路。

“全球化”理论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组织与领土权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建立在特定时刻的社会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交换类型的基础上。交换的类型亦有三种。其一是物质交换,包括贸易和劳动力等。其二是政治交换,支持着武力干涉,合法化与权威性。其三是象征交换,包括口头交往,出版,表演,教育,礼仪,娱乐,宣传,广告,展览,等等。而每一种交换都与特定的空间构成相关联。物质交换倾向于地方化,进行生产力的集中,原材料的调控等。而政治交换倾向于国际化,它包括地域的整合与扩张,处理国际关系(战争与外交),以及确定各地域(区)的权力。象征交换则倾向于“全球化”,它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相形之下最少受限制。所以“全球化”的程度在文化领域甚于经济和政治领域。按照斯克莱尔(L. Sklair)的看法,跨国实践在三个层面上的运作方式如下:政治层面对应着跨国资产阶级,经济层面对应跨国公司,文化意识形态的实践对应着消费主义文化。

虽然过度清晰的划分,有可能使我们落入机械化与简单化的陷阱,但对“全球化”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区分,以及对其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和“互动关系”的细察,是思考“全球化”问题之际保持清晰的理路,进行真正富于成效之对话的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全球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我们不必为可能达致的“整体”的幻觉而弹冠相庆,也不能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导致的—地方性策略的深化、文化差异的强化(甚至是民族主义的恶化)而沾沾自喜。“全球化”所带来的“差异”状况乃至“差异政治”,应当使我们更为深细地洞察种种跨国族之间以及本国族内部潜在的压制与不平等,而不是让我们再一次重复强势文化中心/弱势文化边缘的二元对立思路。就此意义而言,阿帕杜莱对“全球化”状况的复杂性所表现出的高度的警觉与体认是意味深长的:“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秩序,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秩序,我们再也不能用现存的中心—外缘模式(centerperiphery models)来理解这种秩序了,即使是那些主张多中心与多外缘的模式也无济于事。”^⑭

“全球化”是在“地方化”的多元挑战与回应,甚至是处于弱势的地方性知识分子与消费大众的“创造性误读”或是“有意的扭曲”当中,得以具体化的。在此情境下,“全球化”与“地方化”、“本土化”之间错综持久的纠缠,促使对“全球化”问题的思考注定是一种关系式的(relational)认知方式。无论是学院内部的研究者,还是真实体会到“全球化”压力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当他们试图在历史与现实的情境中确定立场,表白姿态,或是亲身介入实践的范畴时,他们必须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可能的答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激进的生态运动的口号才超越了自身的语境,甚至超越了德里克对信奉该口号的“全球资本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所作的有力批判,而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思考者所奉行的一句箴言:“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Think Global, Act Local)^⑮

注释

- ① 请参见该文的中文译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戴永沪,宋伟杰译),《当代电影》,1994年第2期第82—88页。
- ② 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
- ③ 请参见 Kwame Anthony Appiah, “Is the Post – in Postmodernism the Post – in Postcolonial?”, *Critical Inquiry* 17 (Winter 1991).
- ④ Malcolm Waters, *op. cit.*, p. 2ff.
- ⑤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8ff.
- ⑥ Malcolm Waters, *op. cit.*, p. 4 以及第三章。亦请参见 Mike Featherstone 编辑的重要论文集,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⑦ Roland Robertson, *op. cit.*, p. 8.
- ⑧ Johann P. Arnason,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收录 Mike Featherstone 编, *op. cit.*, p. 224.
- ⑨ Malcolm Waters, *op. cit.*, p. 1.
- ⑩ Mike Featherstone, “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收录其编辑的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 1.
- ⑪ 德里克 (Arif Dirlik), 《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陈燕谷译,收录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66页。
- ⑫ 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 《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e Economy),陈燕谷译,收录于《文化与公共性》,第521、527页。亦请参见阿帕杜莱的新作,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ublic Worlds, Volume 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⑬ Malcolm Waters, *op. cit.*, 第一章, “A World of Difference”, pp. 1 – 10.
- ⑭ 阿帕杜莱, 《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 收录于《文化与公共性》, 第528页。
- ⑮ 这是沃特斯在其《全球化》一书第一章正文之前提示性的引文中所刻意凸显的 Theodore Levitt 的原话, 德里克的批判文字, 见其《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 收录于《文化与公共性》, 第443 – 483页, 特别是第469页。